

第二届中国妇女与发展暑期研讨班

1997.7.20—7.26

南 京



研讨班日程

时 间	上 午	下 午	晚间自由活动	备注
7 月 20 日(日)	全天报到		专业组主持人预备会	
7 月 21 日(一)	9:00—10:00 开幕式 10:00—11:30 理论专 题报告 主持:叶南客	理论专题报告	“方法论之夜” 主持:左际平	
7 月 22 日(二)	经济专题报告 主持:王金玲	经济专题报告 主持:王金玲	学术交流、讨论 主持:	
7 月 23 日(三)	经济专题讨论 主持:王金玲	文化专题报告 主持:戴锦华	工作坊:“社会性别与中 国妇女研究” 主持:杜芳琴	
7 月 24 日(四)	参观 负责:	文化专题报告 主持:戴锦华	“传媒研究之夜” 主持:刘伯红	
7 月 25 日(五)	文化专题讨论 主持:戴锦华	健康专题报告 主持:张开宁	讲座:“题目待定”	晚间会餐
7 月 26 日(六)	健康专题报告 主持:张开宁	讨论:代表发言 闭 幕 主持:叶南客	代表离会	

作息时间:

早 餐: 7:30—8:20

上午工作时间: 8:30—11:30(开幕那天 9:00 开始)

午 餐: 11:30—2:00

下午工作时间: 2:00—5:30

晚 餐: 6:00—

晚 间 活 动: 7:30—9:00

报告目录

理论专题:

1. 1993 年以来国内女性研究的理论回顾 刘伯红
2. 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 王 政
3. 社会性别与发展:认识与实践·本土与全球 仇乃华
4. 90 年代英国妇女研究理论面临的挑战——兼与中国妇女研究比较 闵东潮
5. 女性主义·阶级·族裔和本土性 包晓兰
6. 女界对话:中西方之间有多少距离 李小江

经济专题:

1. 女职工在劳动就业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下岗女工现状调查 张秋俭 *
2. 珠江三角洲外来打工妹研究 谭 深
3. 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 金一虹
4. 靠组织联网扩大妇女影响:满城妇女合作社的建立 陈澜燕
5. 论小额信贷:扶贫对象主体问题 徐鲜梅
6. 双织化纤三件套服装、蓝色牛仔裤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结构 苏红军
7. 妇女与发展 马笑冬

评论员:王金玲、包晓兰

文化专题:

1. 大众传媒与“女性话语” 钟雪萍
2. 妇女与商业化文化 马元曦
3. 我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 刘伯红、卜 卫
4. 解析表象 冯 媛
5. 华夏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 杜芳琴
6. 女童生成与发展: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 臧 健

评论员:戴锦华、陈顺馨

健康专题:

1. 妇女生育健康:从实证走向行动干预 胡玉坤 *
2. 生育健康的几个重要问题及其研究进展 张开宁
3. 重新构建妇女健康:多学科的研究与实践 徐 午
4. 用社会性别观念看妇女健康 刘伯红

评论员:张开宁、徐 午

附一:提纲

1. 从“婚外恋”看中国当代社会变化、妇女状况及大众传媒 叶维丽
2.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讨提纲 左际平

附二:《不确定的词语概念:美国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磋商与较量》——序言,费仪·金丝伯格、安娜·罗文哈普特·郑,乌呷译

* 截稿时论文尚未收到,未及刊印。

1993 年以来中国(大陆)妇女研究的回顾

(提纲)

刘伯红

一、形势

1993 年第一次“妇女与发展研讨会”到 1997 年第二次“妇女与发展研讨会”的 4 年间,中国大陆的妇女研究(包括性别研究、妇女问题研究、妇女学学科研究等),在社会转型、妇女自醒、国家扶植、国际社会推动四种力量的促动下获得长足发展,妇女研究领域扩展或关注到包括暴力、人权、环境、传媒、宗教、性学等多个领域,妇女研究队伍有了新的壮大(妇女、高校、社科、社会的合作,老中青,海内外等),妇女研究活动空前活跃(至 95 大会非政府论坛形成高潮),妇女研究成果也影响着中国的改革决策、妇女运动、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

二、主要理论发展

1. 关于社会性别理论
2. 关于妇女和发展理论
3. 关于市场经济转型和妇女社会地位问题
4. 关于妇女人权问题

三、理论挑战

1. 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丰富和发展
2. 关于西方女权主义的分析和批判
3. 关于妇女研究的多样性、不平衡性和策略

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

王 政

西方的中国妇女研究产生于 70 年代初女权主义运动高潮中。二十多年来,这一领域的发展既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化密切相关,又与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息息相通。近年来,中国在海外的学者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新生力量。限于作者的语言能力,本文仅介绍近年来英美的中国妇女研究主要学术成果。本文将把这个介绍与对女权主义理论的探讨结合起来,以便读者理解近期学术成果的思想理论背景,并进一步探索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前景。

从 80 年代中叶以来,女权主义理论的关注点发生明显的变化。早期的许多著述力图追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并且有把妇女受压迫的经历和原因作单一的理解的倾向,也就是把妇女的受压迫普遍化,似乎不管何时何地何种状况,妇女是普遍受到相同的性别压迫的。当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反映出越来越丰富复杂的妇女生活状况时,当第三世界妇女(包括身处第一世界内边缘地位的有色人种妇女)以自己的经历对普遍性的模式挑战时,各种思潮也促使女

权主义学者发展更复杂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妇女所经历的复杂历史和现实。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有力地揭示了普遍论所掩盖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后结构主义更是提供了考察主体构成的多样复杂过程的方法。在这一背景下,女权主义学者在90年代的共识是:社会性别并非产生于单一的、共同的、非历史的“根源”中;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必须置其于具体的阶级、种族、族群、国家、文化和历史中,社会性别的变化意义是在同这一系列不同范畴的交叉及相互作用中发生的。同时,不满于把妇女一概描述为受害者的简单僵化模式,女权主义学者更多地转向寻找妇女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能动作用(agency)。

在这个学术理论背景中,加上改革开放后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的渠道迅速扩大,英美学者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70~80年代的主要著述都关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的关系,并倾向于把中国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来谈。90年代的著述则转向考察中国社会性别多样及多变的构成过程,社会性别话语的多种意义,它同国家、现代化、民族主义的关系,等等。各项研究也以表现妇女的能动作用为重点。从70年代起,社会性别和性文化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关注点。近两年也出现了对中国社会性别和性文化关系的研究。

90年代关于妇女和社会性别的专著论文涉及的范围很广。从时间上分宋代到明清和20世纪这两大部分。20世纪内则有49年前后和改革前后的进一步划分。从研究对象看,包括了城市女工,农村妇女,明清的妇女,民国时期的社会活动分子,女共产党员,妓女等等。从主题看有计划生育,法律中的社会性别,对妇女的暴力,中共早期历史中的社会性别,妇女创作与妇女文化,妇女解放对不同妇女的意义,女性身分的变化,经济改革中农村的社会性别关系,性的话语与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性文化、卖淫同现代化话语的关系,等等。限于篇幅,此外也考虑到有些著述已有中文介绍,(注)故在此仅集中讨论尚无中文介绍的近两三年来的主要研究,包括一些尚未出版的著述,以便读者了解这个领域中理论和方法的最新发展。

一、突破中国妇女是被动的受害者的刻板模式,寻找妇女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

高彦颐(Dorothy Ko)的《深闺之师:17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995)是对明末妇女文化的研究。作者是来自香港的中国学者,在书中她向五四以来的一个概念模式挑战。她指出,20世纪初推动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反儒家的需要建构起一个所谓的“封建传统”,但若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可以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传统”。作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中国女权主义者,她力图以自己的著述改变西方社会持有的第三世界妇女都是受害者的刻板模式,说明在西方的“我们”并不一定比在第三世界的“她们”更解放。作者主要用17世纪江南地区上层妇女创作的诗文来分析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当时的社会风貌。从妇女的自我表现中,作者看到的主要不是抱怨和诉苦,而是各种思想和审美的表达和愉悦感。她提出:中国的社会性别和阶级等级制的活力有赖于这个制度中存在着的让人获得满足的生活的机会。当时出版业的发展,男女有别的行为规范,以及主流社会对“情”的崇尚等互不相关的社会力量综合起来,不期而然地形成了妇女的文学生活领地。家庭成为传授知识、文学创作和娱乐的中心。上层妇女足不出户,却通过阅读、写作及出版同外界沟通。她们的作品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推崇,才女更是成为当地的骄傲。作者还分析了妇女诗文中对金莲的歌颂,认为17世纪上层妇女用缠足来作为自我表现的一种形式,由她们发展起来的缠足仪式是妇女文化的一部分。高彦颐的这一论点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焦点主要在如何看待和表现妇女的能动作用的问题上。

这部著作有力地说明：中国妇女在漫长的历史中都是受害者的概念是现代入为了某种需要构造的。让一个妇女受压迫的单一模式统治了我们对妇女表现的代价是，中国妇女几个世纪里知识和思想的绵延被抹杀了，而妇女的思想史本可以成为现代妇女的一种力量源泉。这部著作有助于打破西方社会持有的单一的中国妇女形象。1984年作者开始这项研究时，许多美国人表示非常诧异：“在传统社会里的中国妇女竟然会阅读和写作？”作者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也很有意义，她对中国现代性的考察不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往后看，而是从“现代前”的角度观察，从而揭示“现代性”的文化演变和构成。

曼素恩(Susan Mann)的《珍贵的记录：中国漫长的18世纪中的妇女》(1997)考察了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性别关系。她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把妇女置于历史叙述的中心，清代的的历史会是怎样的？这样做将要求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上做何种改变？她研究了当时人们怎样理解女性的人生历程，用妇女的诗文来分析上层妇女如何认识和体验自己的家庭生活、知识、审美和私人活动等，考察了国家如何提倡农家妇女的女红，分析了作为娱乐的重要内容性行业，对比了男性对名妓的浪漫描述和被家庭当做摇钱树的年轻女孩的体验，研究了从观音到道教内丹的各种妇女信仰。在她描写的历史画卷里，社会性别关系同那个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密切相连。同高彦颐一样，曼素恩也力图表现妇女的能动作用以及多种多样的妇女生活。作者还对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些理论质疑，如认为现代中国社会许多现象是接受了西方观念而获得解放的结果，作者则认为这种观点是没有深入考察中国的历史文化所致。作者还指出西方对公私分离的关注妨碍了学者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理解，那时的中国社会里，家庭是政治秩序的基础和道德权威的中心，公与私之间并没有一条界线。

二、考察在同其它范畴的变动关系中，社会性别内涵的变化。

90年代女权主义学者力图摆脱对社会性别作本质化的阐释，而努力将其置于具体的场景中做历史的分析。这意味着考察社会性别不同的社会历史中的具体内涵，并关注使内涵发生变化的种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罗丽莎(Lisa Rofel)《现代意象与“他者”现代性》(1998)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社会性别内容的变化。她在杭州一纺织厂进行田野调查，采访了50年代、文革时期和改革时期三代女工，从三代女工身上观察了社会性别内涵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如何同工人这个范畴的变化交叉和同政治经济变迁的关系。这个分析又同她对“解放”的意义的探究结合起来。她指出“解放”对不同年龄的女工有不同的涵义。50年代女工获得解放的感觉同工人的阶级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连。解放前的女工因处在男女混杂的场所而被看成贞操有问题名誉不好的女人，而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场所，解放后却被赞誉为国家的主人，是有贡献的好女人。对这些女工来说，解放不意味着把她们从家庭的禁锢中释放到社会劳动领域，因为她们本平就在家庭之外工作。介是她们被从工作耻辱意义中解放出来了，她们的社会性别身分同她们的工作的意义密切相关。80年代的“工人”和“女人”这两个范畴的含义又有了很大变化，对年轻女工来说，这个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都相对下降的就业领域不能给予她们满足感，更谈不上解放感。她强调由不同政治运动背景造成的不同年龄的女工的差异，并指出改革时期的社会性别政治依然同国家的作用关系密切。罗丽莎的研究表现了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意义的关注，以及后结构主义对话语和主体关系的探究。作者在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背景中微观地剖析一个具体的群体中的

不同的妇女,不仅深刻地表现了人同文化意义的关系,也清晰地展示了形成妇女之间差异的复杂因素。从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把妇女解放定义固定为参加社会生产的简单片面性和非历史性。贯穿此书的另一论点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对现代性的追求源于半殖民主义,而社会性别始终据于这一追求的核心。

伊丽莎白·克罗(Elisabeth Croll)的《中国妇女变化中的身分:20世纪中国的词汇、经历和自我感觉》(1995)考察了三个历史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期)中不同的社会性别词语和妇女的不同经历。她的研究主要基于用英语发表的各个时期的中国妇女写的自我和回忆录及其它文章。作者将这些文字中表现出来的妇女经历和自我认识同官方的出版物对比,指出国家的妇女解放辞藻常常不反映妇女的切身经历,两者之间有很大距离。但是作者没有深入探究国家的话语对各种妇女主体形成的影响和作用。该书的特点是集中了各个时期大量的妇女写作,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

在加贺萧(Gail Hershatter)韩启澜(Emily Honig)和罗丽莎正在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和工作》研究项目里,国家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她们考察怎样影响了类别的界定和参照系数的确立,国家界定的范畴和类别在区域性的社会性别的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以及那些类别的作用是怎样实现的,那些类别是怎样被利用的、被转化、被造成、被忽视的。比如,女劳模是怎样产生的,她的意义何在。这几位学者特别关注国家话语同妇女主体的关系,她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索通过三方面的材料进行,一是官方出版物和文件,二是各类妇女写的描述自己经历的文字,三是访谈。明显地有别于80年代的西方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上述这些研究都不再把共产党为妇女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作为中心问题,而是将焦点集中在妇女的经历上,探究社会性别同其它范畴包括国家的关系。

三、考察国家政策的社会性别含义,包括那些不直接同社会性别有关的政策。

艾伦·贾德(Ellen R. Judd)的《中国北方农村的社会性别与权力》(1994)研究了山东省三个村子的政治、经济、文化每个方面的社会性别情况,把普通农村妇女作为改革中的行动者来描述。作者是人类学者,从1986年到1990年在三个村子作田野调查,每个村子访问二十多户到四十多户人家。由于整个过程有官方陪同,所以她不能着重调查计划生育问题或过于私人的问题,只得考察公开的公共生活方面的情况。她调查了分田过程和随后形成的户与户之间的松散合作。她注意到这些合作一般是以男方家族为基础的。她看到当地农业的女性化现象。她考察了农村政治权力的下放和乡镇企业的情况,看到妇女几乎完全被排斥在领导位置之外,管理、销售、采购也几乎全由男性占领。她指出,当地农村中的每一件工作都界定为由特定的社会性别和年龄的人干的活。妇女在乡镇企业中生产的价值比例很高,但她们的却不占有那个价值。作者认为,这种状况有利于按男性家族结构起来的村子社群的资本积累,事实上,年轻妇女的劳动被用来作为乡村资本积累。作者也调查了农村的商品生产,注意到妇联鼓励妇女参与商品生产,并说明这类商品生产建立在妇女以往在家庭副业中的作用上的。她还考察了专业户,指出成功的专业户在农村形成了明显的贫富不均,并认为妇女在成功的专业户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也就是说,妇女在专业户中的劳动影响到农村阶级分化。作者还指出,男性的劳动建立起户与户的合作,而妇女则很少参与户与户之间的经济合作,这束缚了妇女在经济上的发展。她认为,妇女是积极的行动者,但并非有意识地作为妇女来行动,阶级分化的加剧会进一步加深妇女之间的差异。

这部著作表明,社会性别是农村社会生产核心,也是农村一些权力关系的核心。农村妇女完全融入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只不过是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上。妇女的劳动对公共领域和家庭经济都是关键的,但是她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利和资源或领导权。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农村文化的特征是无处不在的对妇女的贬低。这是第一部全方位地反映中国经济改革中北方农村社会性别情况的人类学专著,颇受学术界重视。

四、社会性别和性文化与界定现代性的关系。

哈丽特·伊文思的《中国的妇女与性:1949年以来关于女性性行为和社会性别的统治话语》(1997)追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的性文化话语(50,60年代和80,90年代),力图辩明其中同女性相关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从对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的分析上是发现不了的。作者的研究主要基于对各种出版物的分析上。她发现文革前对性行为的规范是靠诉诸科学权威来实现的,文革后的性文化的材料虽然多样化了,说教性也不如以前强,但有许多延续的方面。比如妇女的社会性别特点被说成是同她们的生育功能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还有,两个时期都用科学来建构性别差异和支持社会性别等级制。50年代的官方说法是:性欲和性差异是生理决定的对立面,它们决定社会性别行为。90年代这种观点依然存在。两个时期都将妇女的性行为作为性和道德秩序的支点。作者还研究了关于性病、生育健康、优生学、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文字材料,并写了买卖妇女的问题。作者承认关于性的主流话语不一定完全反映日常社会实践,但她同时指出两者相关的一些例子,如自慰的观念和月经期性交的观念同人们实际行为的联系。从性的话语中(包括出版物,习俗,惯例,法律,及维护实施这一切规范的体制机构)剖析社会性别是如何被界定、被构造的,以及由哪些群体出于何种利益需要进行这类界定构造的,一直是西方女权主义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女权主义理论将性文化性行为视为形成社会性别的一个重要场所,从而也是同男性中心文化较量的一个重要领域。伊文思的著述是这方面的理论首次用于分析中国的情况的一个成果。她对所谓科学观点的分析有助于打破我们对科学的迷信和窥破时下流行的不少神话。

贺萧的《危险的愉悦:二十世纪上海的娼妓》(1997)是作者的一部力作,它既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性别史,又是社会史和思想史,也是中国研究中明确地以后结构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来进行研究写作的开创性著作。作者的中心议题是考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是怎样通过对社会性别和性活动的争论来进行的。选择妓女作为研究主题是因为妓女在阶级和社会性别这两种等级制中都处于最底层。著名的印度女权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有句名言:“下属群体不能在话语中代表自己”。“下属群体”(Subltern)是印度下属群体研究团体创造的一个概念,其定义是:“处于底层的人,是对南亚社会中一般从属特征的命名;这种从属性可以表达在阶级、种族、年龄、社会性别、官职和其它方面”。下属群体研究的使命是:把下属群体写进历史去,而这历史以往是由两种精英史学理论所统治的,即为殖民主义统治者服务的理论和为印度民族主义精英服务的理论。贺萧的研究也是同下属群体研究的理论对话。她提出的问题是:由印度等前殖民地国家的学者发展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否完全反映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半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的状况?如何来发现下属群体(比如妓女)的声音?怎样寻找来自底层的能动性和抵抗力量?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后也作过大量挖掘底层阶级的声音和活动的工作,只是这个过程同时是让底层阶级学习运用党的语言,即政治化的过程。鉴于中国下属群体的这个特殊经历,如何来分析辨别什么是下属群体

自己的声音,什么是党和国家的声音?由这些问题所决定,作者在书中以不少篇幅讨论方法论问题。

作者指出,“象其他非精英群体一样,妓女并不纪录自己的生活。她们在历史资料上留存下来是因为别人要对她们欣赏、惩罚、统计、管理、治疗、做病理研究、警告、拯救、取缔或是用作大社会景观中的一个象征”。作者考察的关于妓女的资料包括49年前的游乐指南、传闻轶事、肖像、诗歌小报流言、市政府管理条件、警察审讯纪录、对拐卖妇女的报道、中外改革者对卖淫问题的讨论、医生对性病的调查报告等等。作者认为所有的材料都有用处,但总的来说它们是反映了那些作者的状况,而不是妓女自己的经历。也就是说,那么多丰富的资料并不是用妓女自己的声音来说话的。即使真能得到妓女的声音,那声音也一定经过了某种媒介发出的,即,她们的日常生活斗争和自我看法都已在一定程度上由别的声音和体制形成了。作者因此对历史写作中的“恢复模式”提出质疑,认为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史学家间隔着遥远的时间距离,并且是从自己局部的关注出发,只能对那些材料进行模糊的理解和猜测,而不可能对历史作出“透明性的重构”,即不可能表现一种固定的、单一的、谁看都有一样意义的历史“真实”。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自然不是追求去描述一个“真实”的妓女的故事,而是关注妓女是如何成为一种比喻的,是怎样成为精英和新出现的中产阶级讨论自己的问题的一个媒介的。作者指出,男性精英们都在对妓女的描写中建立起同其他男性精英的关系,表明自己的各种立场。卖淫成了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比喻,其意义是不断变化的。作者在考察各种社会力量在不同时期对卖淫的不同界定以及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复杂意义时,还着力从他人记述的材料中寻觅妓女抵抗的蛛丝马迹。与斯皮瓦克不同,作者认为,许多下属群体成员还是发出种种与主流不和谐的声音,她强调,对有些话语(主流和非主流的)只能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去观察到。

五、探究男性特征的构成及其意义。

由于认识到妇女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实体,而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形成的,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往往同对男性的规范或男性的特定处境相关,所以不少女权主义者开始研究男性的构成以此来加深对社会性别过程的认识。钟雪萍对中国当代男性的研究是中国社会性别研究中这方面的先例。在《男性特征、焦灼与民族主义:对男人的再表现及男性对社会身分的探求》一书中,她把当代中国对身分、使命和认可的追求同当代文学中表现的男性特点结合起来分析。她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男性作家最关注的社会性别问题?为什么?假如说这些问题常常突出一种对“阳衰”的焦虑,那么是什么因素构成了这种焦虑?如何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中,尤其是同中国现代性相关的问题中的男性概念?形成了当代中国男性渴求“男子气”的复杂心理的政治、文化、历史因素是哪些?在今日的全球背景中,中国男性的这种渴求具有何种意义?作者的分析材料是文学作品,主题则是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关系。

六、表现妇女自己的解放斗争。

仇乃华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与妇女运动》从中国妇女的具体历程出发来反映中国的妇女运动。因看到西方学者很少关注到中国妇女组织,作者致力于调查妇联的历史,以从组织上探讨党与妇女的关系、妇联的复杂性及其在中国社会的作用。作者考察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文化,并作了许多访谈,完成了英语世界中第一部史料详实的关于中国妇联的

专著；作者提出中国的妇女运动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这部专著表达了一个中国学者探究中国妇女独特解放历程的努力。

我本人的《女权主义与中国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则考察了另一个历史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我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救星诞生以前中国妇女在干什么？本书中的方法是用历史资料来表现本世纪初主要由男性知识分子领头建构起来的女权主义话语，用五四新女性的口述史来刻画那个时期出现的新的女性主体。本书探讨了女权主义同民族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分析了新文化男性知识分子之成为现代精英同提倡妇女解放的关系，展现了那代知识女性非凡的能动作用。本书说明：女权主义在中国远非主流话语所表现的那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幻想和一场失败的运动，相反，作为一个话语，她不仅在本世纪20年代构成了现代中国妇女的一个主体，给予中国妇女进入男子独占的社会领域的力量，在30年代造就了一个现代职业妇女群体，而且她也被主流话语所吸收，成为构成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景观的重要部分。在探究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的同时，本书也揭示了女权主义一词的词义变化背后的各种政治力量的运作过程。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著述不同，本书不是将政党而是将妇女作为历史的主角，目的不仅是表现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的主动积极作用，也是探究在何种情况下妇女拥有社会活动空间。本书也是一个中国学者以中国妇女的实践来丰富女权主义理论的一项努力。

综上所述，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探究其意义，即现象背后含义或是社会力量和各种利益的运作较量。每项研究都在探究特定现象的意义中，力图去打破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和假定。研究者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这种现象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观念？这种现象基于何种假定和“常识”？这些假定和“常识”又是怎么来的？蕴含了什么样的权力关系？谁在促成这种现象的形成？为了谁的利益？此外，从对上述著作的简短介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妇女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对妇女的研究，而是将妇女和社会性别关系置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中来考察，不仅考察社会历史变迁对妇女人生的影响，也注重妇女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看她们是在怎样的社会性别关系中活动的，怎样受到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性别话语的制约，怎样向其挑战的？并十分关注社会性别同其它范畴的相互作用，以及其它范畴如何通过社会性别来表达的。

同国内的妇女研究相比，国外的中国妇女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性别是其核心分析范畴。近来的研究表现出对此范畴日益复杂的运用和不断丰富的理解。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的创立同女权主义在学术界的目标紧密相连，即，对男性中心文化提出批判质疑，改造人类知识，从而转变男男女女对世界、对自我的认识，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正是在这个大目标下，才产生了不甘于接受古今权威设定的结论，勇于开拓创新的丰硕成果。这部分努力尽管没有表现为女权主义学者直接参与对妇女政策的制定，但无疑是女权主义改造男性中心文化的重要实践，其深远意义不可低估。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文化中，都由一定的观念、知识、习俗、惯例构成我们的思维、言行举止。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构成以及自身所处的文化构成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在参与决策时做出清醒的抉择。现实生活中有大量例子说明，并非因为我们是女人，便自然而然能为妇女谋利益。我们所主张的东西在哪些方面符合妇女利益？符合哪些妇女的利益？我们根据什么来判断这样做是符合妇女利益的？我们据以判断的标准或价值准则是哪里来的？这些都是

任何妇女研究者和妇女活动分子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换言之,观念,概念,假定这类思想知识范畴的东西是我们每日实践的内容,若不把这部分内容搞清楚或是保持警觉,我们的实践便会有很大的盲目性。女权主义的学术则包含了这部分内容。

国外的中国妇女研究虽然涉及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这些成果大部分不会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影响。能够在中国直接参与改造文化、改造社会的学术成果还要靠中国学者的创造。96年由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举办的暑期研讨班体现了我国妇女研究者发展妇女研究,尤其是在高校发展妇女学的迫切愿望。希望这次研讨班能进一步具体商讨学科建设的计划。在此我提出两点建议,以期引起讨论。

1. 举办分学科培训班

目前国内虽然有20多个院校建起了妇女研究中心,但是学术界的妇女研究力量仍很薄弱,要考虑吸收更多的学者参加妇女研究的行列。分学科办培训班也许是一条途径。可由国内外本学科学者任教,介绍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理论方法,发结业证书。目的是让各学科中原先不太懂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获得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参照,从而开始她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教学。分学科办班也有利于同一专业的研究人员形成网络,加强交流。

2. 召开跨学科的妇女学研讨会,促进各妇女研究中心及各学科间的交流。

高校妇女研究中心有研究和教学的双重任务。在教材的撰写和课程设置方面若能协同努力,或许能较有效地利用目前有限的资源。此外,国外妇女学的繁荣同频繁的学术交流和活跃的学术批评分不开。如果我们没有条件学人家那种通过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来实现频繁交流,至少我们可以学不受物质条件限制的坦诚的学术批评风气。妇女学是一种开拓,包括学风上的开拓。思维要活跃,探讨要深入,没有开诚布公的批评是难以实现的。希望看到妇女研究产生大量不仅赞扬成就也挑毛病的学术批评。

注:其它有关介绍参阅本人的“美国女性主义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角度”,《西方女性主义学术评介》,鲍晓兰主编,三联:1995;和“评介柯临清著《从社会性别角度看中国革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4期,1996年8月。

本文写作参阅了贺萧正在写作的“西方对20世纪中国社会性别的研究”,和贝费莱·包斯勒(Beverly Bossler)未发表的“宋代以来研究著述”。作者在此对她们的大力协助表示衷心感谢。

文中提及的书目原文

1. Dorothy Ko, *Teachers of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Press, 1995.
2.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alifornia: Stanford Press, 1997.
3. Lisa Fofel, *Modern Imaginaries and "Other" Modernit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4. Elisabeth Croll,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 Rhetoric, Experience and Self-percep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1995.
5. Ellen Judd, *Gender and Power in Rural North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Press,

1994.

6. Harriet Evans,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Dominant Discourses of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7.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8. Zhong Xueping, *Masculinity, Anxiety, and Nationalism: Representations of Men and A Male Search for Ident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9. Zhang Naihua,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Chinese Women and Women's Movement, 1949-1993*. Dissertation.

10. Wang Zheng, *Feminism and China's New Women of the May Fourth Er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社会性别与发展:认识与实践,本土与全球

仇乃华

始于七十年代的妇女与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最初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忽视妇女对发展的贡献,及发展对妇女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批判。经过二十多年的开拓,已成为一个富有活力与成果领域,对发展及妇女研究这两个领域同时造成了冲击与影响。在发展领域,它的出现,显示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一领域的崛起,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以西方观念及模式为主导的重物不重人,自上而下的发展计划与战略提出了全面挑战。它对妇女研究的贡献在于它引起人们对第三世界女性状况与地位的关注及对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对世界各地妇女的影响的注意,进一步推动了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崛起。最初为促进妇女参与发展的努力导致了第一个联合国妇女年,联合国妇女十年及其后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推动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女性间的交流与对话,为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妇女与发展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学科与领域。作为研究妇女在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作用及变革对妇女的影响的学科,它与发展领域紧密相连。在发展领域中的几个主要作用者包括:

(1) 制定发展计划与战略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

从事发展与援助的国际组织及第一世界从事发展的多边及双边组织。由于他们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及资金,对第三世界国家采取什么计划与战略有巨大影响。

(2) 从事发展研究与实践的学者与专家。政府及国际组织依赖他们对国际秩序及有关发展的政治经济问题作出分析及开出如何促进发展的药方,并帮助贯彻执行。

(3) 发展计划的对象及受援人,发展中人的因素。

在这里发展作为有计划、有目的的过程与活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不言自明的。

除此原因之外,在妇女与发展领域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由于它是在女权主义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基于女权主义的传统,她们不只把妇女看作发展的受援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强调妇女作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不仅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发展必须以

促进人的发展为终极目标。一部分女权主义者更明确提出“赋权”(Empowerment)这一方式,即通过发展项目,通过自下而上的组织与活动,促进妇女自强。

鉴于此,我准备集中讨论妇女与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中的几个问题,在理论部分讨论妇女与发展中的三个主要流派与方式,在实践部分介绍进行性别计划的方法,最后提出几个问题,与国内同行交流讨论。

一、“从考虑思考开始”:有关妇女与发展的三个理论流派与方式

首先引一段话:“我们在世界上做什么反映了我们对它知道些什么。我们知道些什么取决于我们是如何获取知识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考虑变革时,应该从考虑思考开始”。

“考虑思考”就是要认识到发展及实践中的不同作法不仅仅是具体技术问题。它往往是不同指导思想的反映,尤其是对发展的终极目标与性别及妇女在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根本问题的思考的反映。在不同指导思想之下的发展项目,会关注不同问题,采取不同方式,而有不同结果的。

在妇女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先后出现的三种主要不同的理论与方式可以其对妇女与发展关系的认识归结为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 WID),妇女与发展(Women and Development WAD)及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GAD)分别表现了自由派女权主义者(WID), (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WAD)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妇女与发展的看法(GAD)(见埃娃·拉斯博格文章)。

概括起来,妇女参与发展方式关注的是如何促使妇女作为生产者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他们认为贫困及不发达是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妇女积极参与发展即能保证发展更有效有利。这也就有助于妇女争取平等。他们并不对现存秩序、对整个发展机构及计划方式提出质疑,这是因为他们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相信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化是好的,是第三世界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途径,关键只是是否执行的好。基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认为理性的人有追求自由自主的动力,只要排除个人面临的障碍,即可帮助人获取自由。因此,他们居然也促进立法改变,以给妇女更平等的机会,并推进教育,提供信贷,帮助妇女创收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在现存体制下采用技术手段就能解决的问题。这种方式与保守的相信现代化理论及市场经济的政府国际发展组织本出于同一理论体系,所以容易被发展机构接受。他们提出的效益方式,正符合这些机构的发展目标,至今仍是国家与国际机构对待妇女与发展的主要方式。

持妇女与发展观点的人认为不存在什么“妇女参与发展”的问题,因为妇女从来就是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只不过妇女的经济贡献是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服务罢了。由于这一派的理论根基在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注重阶级压迫问题,与发展中的依赖理论相似的是,认为加入资本主义发展只是加重对资本主义的依赖罢了。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自力更生,认为妇女只能在男权制的权力结构之外得到发展。他们尽量不与传统的发展结构发生联系,当然也未进入发展领域的主流。这种方式多为一些非政府组织所采用,搞一些帮助贫困妇女的小型项目。

八十年代兴起的社会性别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相连,因此把资本主义及男权制同时作为妇女受压的根源。他们把妇女所受的压迫放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中来考查。因此其分析不囿于妇女本身,而更关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是如何形成,

并与阶级、种族、民族及其它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互相作用,同时对妇女发生影响的。它因此以社会性别与发展为关注点,采取赋权的方式,强调妇女组织起来,发出更强有力的政治声音。

由于它主张对现存的社会组织进行结构性的改变,也未能进入发展领域的主流,虽然有个别发展机构对这类项目,尤其是研究项目,给予支持。但社会性别与发展毕竟是最近发展起来的模式,由于它提供了较大的批判性的空间,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都在这里找到了可以发出自己声音的地方。

如果纵观从妇女参与发展到社会性别与发展的过程,我们所见到的是从把妇女作为孤立的变量“加入”发展进程转向把妇女放在她的所处的社会性别与阶级等社会关系中来检验;从把妇女当作“问题”,当作不发达的表现,因而从妇女身上寻求解决办法,到把妇女当作发展的能动者,为发挥她们的作用创造条件;从推进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到对此进行批判转向对人的发展的重视,及从重视第一世界专家的知识到强调第三世界妇女的知识及体验。

社会性别与发展的提法被广泛使用,大有取代妇女参与发展的提法的趋势。但是并不是所有使用社会性别与发展的字眼的人都是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及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角度使用这一概念的。也有一些政府及国际发展组织使用这一提法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突出妇女,认为单提妇女具有妥协性,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他们听起来更具有中性色彩,可以既讲男又讲女,回避在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中,要把处于边缘的妇女放在中心位置的关键问题。可见,在讲社会性别的人当中,这个词也可以被用来表示不同的意义的。

那么,在发展实践中,如何批判地使用社会性别概念呢?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凯瑟琳·摩塞首创的社会性别计划方法,这一赋权给妇女(Empowerment)的发展模式。

二、社会性别计划

所谓社会性别计划就是要在政策制定,计划设计及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把社会性别作为中心因素,以妇女解放为目的,通过满足妇女的战略性及战术性社会性别需要来达到两性间的平等、公正、并赋权与妇女。

在社会性别计划中,有几个关键概念。

1) 妇女的三重角色,劳动的性别分工及家庭,妇女的三重角色指妇女承担的再生产,生产及社区管理的角色。

检验妇女承担的三重角色提起人们注意劳动及责任的性别分工,注意到这种分工不是“自然”的。除了女性要生育,哺乳之外,性别不应成为确定男女劳动分工的组织原则。这种分工把男女所做的工作分开,并以此证明赋予男女劳动以不同价值的做法的合理性。认识到这一点,能够帮助人们把劳动的性别分工与妇女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

在考察男女不同角色时的着重点同时在家庭及家庭户。与许多发展项目单纯注意贫困家庭的作法不同的是,这种计划方式不把家庭看作是具有同一模式的、自然的内部和谐的社会单位。它注意到家庭的结构组成是由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它不仅注意家庭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还注意到家庭内部的关系,注意到由于男女在家庭内部地位的不同,对资源的控制,获取资源的便利不同,因而男女不仅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有不同的需要,对这种角色与需要的区分是进行社会性别计划的根本之点,并据此确定妇女解放的长期目标是什

么。

2) 妇女的战略性及战术性社会性别需要及国家。

摩塞沿用了马克新·莫雷纽所用的区别“妇女利益”及“妇女的社会性别利益”的提法,“妇女利益”或“女性利益”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利益是建立在妇女生理基础之上的,忽略了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除了性别之外,还取决于其它诸如阶级、种族、民族等因素。因此,莫雷纽主张用“社会性别利益”来指那些妇女(或男子)的“由于其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而可能产生的利益,这种地位是与其社会性别属性相关的”。此种利益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及战术性社会性别利益。在摩塞的计划模式中,被转化成妇女的战略性与战术性社会性别需要。

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指长远的,为妇女争取平等及解放而产生的需要。在分析妇女为什么受制于男子,分析男女两性之间关系的结构与性质的基础上产生。

战术性的社会性别需要指妇女在完成自己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过程中产生的需要,它不对两性分工或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提出质疑,尽管它们也可以被用来推动更根本的变革的切入点。它们只是妇女在具体情况下,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而认识到的需要。

这两个概念与其它两个概念,即妇女的地位(Position)及状况(Condition)相似。

在认定及满足妇女的需要,尤其是妇女的战略性及战术性需要上,国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基本概念之外,社会性别计划还意味着一套新的特定的计划方法,摩塞讨论了进行社会性别计划的工具,程序及社会性别计划实践包括的内容。比如,可使用的工具包括对社会性别角色的认定,对社会性别需要的估量,有关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及男女在控制资源,作出决定方面的数据;把社会性别计划与其它方面的计划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方法,如何对照WID及GAD所采用过的政策,考虑如何更有效地满足妇女的需要;以及保证妇女及对社会性别有意识的组织及计划者被包括到计划过程之中。社会性别计划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妇女的参与。参与认定自己最首要关切的问题,参与制定方案及其实施,在此过程中使自己强大起来。它因此被作为争取解放的过程的一部分。

摩塞的社会性别计划方式不是一切都好,对这种方式也有批评。但它仍不失为一种可供我们参考的方法。

三、有关妇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最后,我想提出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思考、讨论,以探索如何把上面谈到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供我们借鉴。比如,关于妇女与现代化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全民族的渴望,但是不是因此现代化就变成了不容置疑,不容讨论的东西?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终极目标,走什么道路?是不是现代化的实现就意味着妇女的解放?

又如妇女的战略性及战术性社会性别需要在我国,在各种问题上是如何表现的?在我们急于解决妇女面临的战术性的社会性别需要时,是不是也想到了它们与妇女的战略性及战术性社会性别需要的联系?我们是如何认识中国妇女的战略性及战术性社会性别需要的?在这方面有哪些不足与误区?

最后,关于本土化与全球化的问题。自从中国开放以后,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如何认识国际经济发展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与国际妇女运动接轨然而又

基于中国的实际在自己的本土上建立自己的运动与妇女研究?

希望对这些问题以及其它有关问题的讨论,能深化我们对有关妇女与发展的认识,并提出新的问题,以帮助、指导我们的实践。

90年代英国妇女研究理论面临的挑战

——兼与中国妇女研究比较

闵东潮

(提纲)

英国的妇女研究从80年代在学术界立足(在这方面,英国走在其它欧共体国家的前列)。进入90年代之后,妇女研究在理论上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进入了一个自我反思、自我怀疑的阶段。

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多样性”(diversity)的挑战

这里的“多样性”指的是妇女之间的“差异”(鲍晓兰的讲座中对“差异”有专门论述),但一些妇女研究的学者使用“多样性”一词而代替更为通行的“差异”,有其进一步的考虑。

“多样性”的提出,最早出自美国的黑人妇女,她们以自身的经历,批评妇女研究、女权主义只代表了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而后又有对第三世界国家妇女的分析推波助澜。

“多样性”对妇女研究、女权主义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原来女权主义所提出的被认为是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现在看来只是代表了一部分妇女的经验、观点,这样就把60~70年代妇女运动中提出的妇女共享的姐妹情谊推翻了。二是妇女被压迫的原因多种多样,男性的压迫只是其中一种。更进一步看,妇女之间不仅是存在着“差异”,而且还存在着一部分妇女对另一部分妇女的压迫。因此,把妇女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就出现了问题,既然妇女不能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不再具有共性,妇女研究的存在便成了问题,原有的女权主义的理论框架受到挑战。

其二、“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挑战

80年代中期以后,性别研究成为显学,妇女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受到冲击,甚至有再次消失的可能。

一些妇女研究的学者对此甚为担忧,她们认为,首先,妇女研究作为性别研究的对立面,对主流文化进行了挑战,妇女作为一种分析的范畴,对无阶级、无性别、无种族、无问题的个人提出了挑战,政治性比较强。而性别研究侧重两性关系,虽然也是在研究两性之间的差异,但不是那种不平等的差异,这样就很有可能把妇女研究、女权主义的东西非政治化了。其次,保留妇女研究,也是在学术界给妇女保留一个空间(这里的学术界指所有教育机构,而不只

是大学)。

其三、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关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可参阅李银河的文章“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载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1996年第3期)

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出现了大量的有关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的讨论。面对这一发展,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这种讨论是一种知识上的新时髦,还是女权主义应该严肃对待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主要在学术知识和政治两个方面:

学术方面:后现代主义对女权主义提出的一些理论,如父权制、劳动的性别分工等范畴、概念进行了批评,认为如果缺乏对其进行历史的、社会的分析,不但不能使其削弱,还很容易使其增强。归根到底,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一个“妇女”的主体,对妇女研究、女权主义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政治方面,后现代主义体现了一种非政治倾向。如果把“妇女”这个主体解构了,“妇女”处于一种流动变化中,那么,女权主义立足点在哪?如何分析男性中心社会的权利、特权和压迫的问题?政治活动从哪里开始?如何开展?

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是最大最基本的挑战,前面两个挑战都是由此而引发的。(另外一个挑战是认识论上的,因暑期将有专人讲这一问题,故此省略)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挑战?社会背景上的一些因素值得注意。

英国的妇女研究学者对这些挑战的应战。她们对妇女的多样性;性别研究和妇女研究的关系;物质与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相应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妇女研究的策略。

二

中国妇女研究面临的一些矛盾与对策:

1. 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与性别盲点的矛盾。
2. 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与应用性、政策性研究的紧迫需求的矛盾。
3. 几点建议

搞活思路,用足政策,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

(如果时间条件许可,我将以自己参与妇女研究的经历来反思妇女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发展。侧重在如何评价国外女权主义理论?如何建立妇女研究的课程?如何使妇女研究“本土化”。)

女性主义、阶级和本土性

鲍晓兰

本发言将通过历史和理论发展的分析,探讨以下两个相关的问题:一、认识妇女中的差